

托尔斯泰的解脱

[俄] 布宁著

陈馥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新世纪万有文库
新世纪



064

2

新世纪



新世纪万有文库

本文库为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托尔斯泰的解脱

[俄]布宁 著 陈馥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托尔斯泰的解脱/(俄)布宁著;陈馥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1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4辑·外国文化书系)

ISBN 7-5382-5294-0

I. 托… II. ①布… ②陈… III. 托尔斯泰-文学研究 IV. I512.07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7067 号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刘国玉 王之江 柳青松 袁启江
总 发 行 人	俞晓群:
责 任 编 辑	柳青松 王丽君
美 术 编 辑	谭成荫
封 面 设 计	郑在勇
责 任 校 对	刘 璠
出 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发 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625
字 数	124 千字 插页 1
印 数	1—3 000 册
定 价	6.70 元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四辑弁言

在《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二辑弁言里，我们提出十二个大字为“据以继续行进的座右之铭”：不求显赫一时，但愿传诸久远。两年来，大体上在循这方向工作。

据专家研究，当年王云五先生策划《万有文库》，雄心是要通过这套丛书，使得任何一个人或家庭乃至新建的图书馆，都可以通过最经济、最系统的方式，方便地建立其基本收藏。对于云五先生诸如此类的雄心壮志，美国的《纽约时报》曾有论评，说他是在“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对于当时战火遍地的中国，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举措。诚如专家们所说，这可能是旧中国的年代里，“在界定和传播知识上最具野心的努力了”。

对于今天的中国，吾辈有幸，已经不复再有书本与子弹之间的选择。但是在人生的历程中，选择终将存在。我们师法先贤，着眼现实，把当今出书的选择重点放在久远，而非一时。我们希望，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期急待造就新的公民的过程中，这套书能起到一种基本资料的作用。读者在这里，不大可能发现新潮奇思、时论近说，更不会见到种种足以刺激当代人感官的精神“子弹”。我们希望提供的只是一种真正的“书本”，那些经过历史的久长考验、几世代读者的不断考诂，因而得以积淀留存的

“书本”。在今天做这工作，不免有“老掉牙”之讥，而由我辈过去并无很多历史积累的非王牌出版社行之，更有汲深绠短之叹。但是，据我们浅见，造就一代新民，在众多英豪前瞻未来之余，实在还需要研读旧籍陈典，了解历史故实，掌握前人经验。人类之所以有“书本”一物，其主要功用之一，不正在于此乎？！

按此设想检视，传统文化、近世文化、外国文化三部分，第一、二部分大抵可以仍旧，第三部分则今后需更多侧重历史典籍，及其相关资料。当今满城争说新世纪之际，我们却一再奉劝读者，何妨返顾已经过去的近一二个世纪的世界，看看当年域外诸景，也许对于方今之决策，不无裨益。因为终究来说，我们在新世纪来临之际，也许会想到，中国或许还有一些功课要补做——为了以后更伟大的未来！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译者的话

列夫·托尔斯泰是举世公认的世界级文学巨匠，他同时又是一个引起最多争议的人。一些人说他是“世界的良心”，一些人又几乎把他说是伪君子。他晚年的出走更成为人们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

本文作者俄国作家伊万·布宁从小崇拜托尔斯泰，曾经一度奉行托尔斯泰主义。他接触过一些托尔斯泰信徒，也登门拜访过托尔斯泰本人。托尔斯泰与布宁的父亲同辈，布宁对他从多方面怀有深深的敬仰之情。

布宁侨居国外以后，大量阅读了当时发表的有关托尔斯泰的回忆录和文章（多半是俄国人写的）。在托尔斯泰逝世四分之一一个世纪的时候，用布宁的话来说，大家都觉得托尔斯泰“那经过一再修改的形象已经完整准确、不偏不倚地确定了”。然而布宁以为，“这个形象的某些终于被注意到并被领会了的新的特征还没有能够动摇以往对他的看法”。因此布宁要来谈谈自己对托尔斯泰的看法。

布宁给自己的文章冠以“托尔斯泰的解脱”这样的标题，而且一上来引用了佛经里的话，表达了他对托尔斯泰其人的独立见解。

既然人的肉体，人在尘世的一生经历，只不过是“相”，而非生命的实质，那么又何必执着于它，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呢？因此托尔斯泰从“愤怒”逐渐走向“宽容”。他虽然对家人多有怨尤之词，却并未强迫他们接受他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当布宁去拜访他的时候，他也对布宁说：“您想过普通的劳动生活吗？这很好，不过别强迫自己，别把它当军服穿上。过任何一种生活都可以做一个好人……”

是否可以这样说：种种的对抗与伤害，根据佛的教义来看，都是由执着于虚妄人生的种种“相”产生的，而只有从虚妄人生的种种“相”中解脱，才能找到真实的“我”，才能发现“我”与“一切”（即中国人所谓的“天地”）原为一体；“一切”是“同一生命”，而“我”是“同一生命”中的一个分子？那么托尔斯泰与俄国东正教教会从对抗走向和解为什么就不可能呢？这个“和解”不是“投降”，只是“不对抗”，只是“宽容”，让各人自己去回归。

托尔斯泰受人指责最多的莫过于他的所谓“勿抗恶”的说教。其实“勿抗恶”的提法是不完整的，因而也是不准确的。托尔斯泰的原话是“不以恶抗恶”，根据是，以恶抗恶并不能减少恶，而只能增加恶。在《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中宣布了一些典章，其中包括著名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利未记》第二十四章、《申命记》第十九章中又重申过）。然而这话也不完整。完整地引出应为：“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堕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可见这里说的“还”是由审判官作出断决后的一种惩罚，罚定由伤害者“还给”被伤害者他所伤害的，而且只能以眼还眼，不能以眼还牙，或者以牙还眼……这是古代的典章。看来人们逐渐把它变为被伤害者对伤害者施行任意报复的依据了。因此到了新约时代耶稣才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互相伤害只会使伤害升级，以恶治恶未必能治恶。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托尔斯泰晚年热心研究孔子、老子、佛，从他们的学说中悟到了许多东西。他尤其欣赏老子所说的“上善若水”，觉得精辟极了。佛家提倡“忍”，老子提倡“无为而治”，都是源于对人生的深刻的“悟”。

托尔斯泰的一生也是一个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的历程。只因他有着“无所不包而又混乱无序的智慧”，他的这

一历程才显得格外复杂。托尔斯泰爱“真”，一生追求“真”。一个人有这样复杂的人生经历，又总说真话，其结果可想而知。

作家或者著作家和常人不同之点在于他们有强烈的自白欲、笔谈欲。如果他们只是在脑子里想想，什么也不写，自然不会引起任何非议。不过这样一来人类的思想就很难向前发展了。任何人之所以有思想见解，全都有赖于前人今人（包括亲朋）将他们的思想见解说了出来或写了出来，而且不可能是一面的思想见解，因为生活本身就是多面的。事物总是在矛盾中沿着螺旋形的轨道向上发展。由此看来，无论哪一种思想见解，在人类思想发展的长河中都有它存在的必然性，起了一定的作用（正面或反面的）。“纯而又纯”是少数个人经过长期修炼可以达到的一种至清的思想境界，或者说精神境界，而不可能在一个庞杂的大社会范围中实现。因此我们在争论的同时还必须要有宽容的态度，这种宽容是由对事物存在、发展的自然规律的深刻认识产生的，而不是简单的“大度”。

布宁决定写这篇文章显然是出于对托尔斯泰的特殊崇敬和爱戴。然而布宁没有，也不可能最后理清托尔斯泰的思想。何况，看得出，他对这篇文章并没有像对他的艺术作品那样反复修改加工。他的主要目的在于纠正人们对托尔斯泰的某些误解，而译者以为他的纠正是有说服力的，所以才决定把这篇文章翻译出来介绍给对托尔斯泰感兴趣的读者。

陈 馥

1998年 北京

“众比丘，如来不贪著。众比丘，如来即佛。解脱生死法已得，汝今谛听。”^①

托尔斯泰也谈“解脱”，他说：“空间、时间、原因都是思维的形式，生命的实质超乎这些形式以外；不仅如此，我们的整个生命是越来越屈从于这些形式，然后再从这些形式中解脱……”

在这段从未有人提到过的话里，包含着指引我们去全面理解托尔斯泰其人的锁钥。

阿斯塔波沃火车站使他的“解脱”得以完成，那是他毕生追求的，尽管他同时又极能“屈从”。

我记得他曾经非常兴奋地用毕达哥拉斯^② 的话说：“人啊，你除了灵魂以外一无所有！”

我知道马可·奥勒利乌斯^③ 有一句口头禅：“我们的最高使命是准备迎接死亡。”他甚至留下了这样的文字：“要时刻准备死，学习更好地死。”“我是安东尼，但我又是一个人。安东尼拥有的是罗马这座城市，这个国家；而人拥有的是世界。”

① 作者引自西方翻译的佛经，出处不详。（译者注。以下，凡未注明来源的均为译者注）

② 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80～500），希腊数学家、哲学家。

③ 马可·奥勒利乌斯（121～180），自161年起为罗马安东尼王朝皇帝。

托尔斯泰在达到他的智慧顶峰的年代，不仅没有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甚至也没有世界。他只有上帝，只有“解脱”，出走，回到上帝那里去，与上帝融合，重新融合。

安德烈公爵听娜塔莎唱歌的场面，托尔斯泰是这样写的：

“他突然意识到在他的心中那无限大然而还不分明的东西与那有限和物质的东西之间的可怕对立，物质的东西就是他本人，甚至是她。在听她唱歌的时候，这个对立使他既苦恼又愉快……”^①

这种对立使托尔斯泰苦恼了整整一生。

安德烈是怎样死的呢？

“在他受伤以后过着孤独半昏迷状态的生活的时刻，他越深入地思考那他得到启示的永恒的爱的原则，他就越不自觉地摒弃那尘世的生活。爱一切东西，爱一切人，永远为了爱而牺牲自我，那就意味着谁也不爱，不过尘世的生活。”

“众比丘，解脱生死法已得，汝今谛听，当为汝说法。汝但能奉行，即得善男子离乡背井所求如来无上成就，于今世亲见其道。”

基督也叫人离乡背井，他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不为我撇下父母的不会跟从我。”

这种离乡背井的善男子不在少数，有悉达多·乔答摩王子，有义人阿列克谢，有慈悲的尤利安，有圣方济各……还应该算上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列夫长老。

^① 见托尔斯泰所著《战争与和平》，刘辽逸译，下同。

二

“我出生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村，并且在那里度过童年时期……”

他那部未完成的《早年回忆》一开始这样写道。这部书是为他的朋友和信徒、当时准备为他作传的比留科夫写的。托尔斯泰把他的一生按七年一段分期，他说，“连某些生理学家都承认，可以一个人的肉体生命七年为一期相应地确定其精神生活的七年发展状况。”这样七年七年地算下来，还差一点就是十二个七年。

第一个七年——童年时期：

出世，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生活。他是尼古拉·伊利奇·托尔斯泰伯爵和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托尔斯泰姬伯爵夫人（出嫁前是沃尔孔斯卡姬公爵小姐）的儿子，生于1828年8月28日^①。次年丧母，当时母亲才三十九岁。在家里由一位德国血统的家庭教师指导启蒙读书，就是他在《童年》中称之为卡尔·伊万诺维奇的那位先生。

第二个七年——少年时期：

在莫斯科同家人一起生活，并且继续读书。八岁上失去父亲，父亲是因为心脏病突发而亡故的，享年四十二岁。

第三个七年——青年时期：

无父无母的托尔斯泰兄弟迁往喀山投靠祖母，就读于喀山

^① 本书所用日期均按旧俄历。——作者注

大学。由于学习成绩不佳^①，也因意识到“这些学科教的东西毫无用处”，托尔斯泰于第二学年即辍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专心务农，并且关注他的农民。他在这方面也失望以后，又去了莫斯科，后去彼得堡，想谋个文职。

第四个七年，从二十一岁至二十八岁：

谋个文职的希望破灭。去高加索服役，后来在被围困的塞瓦斯托波尔。开始创作。这七年当中他写出了《童年》、《少年》、《青年》、《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暴风雪》、《两个骠骑兵》、《一个地主的早晨》，并且开始写《哥萨克》。

第五个七年，从二十八岁至三十五岁：

退役，为了解欧洲的学校教育状况去国外旅行。回国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从事教育和司法工作，结婚——娶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别尔斯为妻。完成《哥萨克》，开始写《战争与和平》。在这七年当中，他先失去三哥德米特里，后又失去大哥尼古拉。

第六个七年，从三十五岁至四十二岁：

家庭生活，已有四个孩子，料理家务，写作，出版《战争与和平》。

第七个七年，从四十二岁至四十九岁：

① 学习成绩不佳主要应归因于年轻的托尔斯泰当时的上流社会生活方式。他进喀山大学后，起初在阿拉伯、土耳其文学系，由于生活懒散而未能升入二年级，便转到法律系去了。然而法律系也未能引起他对大学教育的兴趣。他曾经向一位同学问道：“我能从大学学到什么？等我们返乡以后，我们能从这座神圣的殿堂里带回什么东西去？我们能干什么？谁又需要我们呢？伊戈尔王之死，咬死奥列格的毒蛇——这些不是童话是什么？谁需要知道伊凡于1562年8月21日第二次结婚，娶了捷姆留克的女儿，于1572年第四次结婚，娶了安娜·科尔托夫斯卡娅？历史又是怎么写的呢？伊凡雷帝从1560年起突然从一位仁者智者变成一个丧失理智的暴君。他是怎么变的？什么原因？别想问出个道理来！”因此对所谓“公认的”抱挑战性的蔑视态度，其实也是出于对“解脫”的渴望和对“屈从”的抗争，作为他的最主要的性格特征之一，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作者注

去萨马拉省以马奶酒治病。在当地为饥民工作。写《安娜·卡列宁娜》。又生了四个孩子,其中两个男孩夭折。

第八个七年,从四十九岁至五十六岁:

写《忏悔录》。为了子女的教育举家迁往莫斯科。与切尔特科夫相识。写《人靠什么活着》、《我的信仰是什么》、《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又生一子一女(小女儿亚历山德拉)。

第九个七年,从五十六岁至六十三岁:

家居莫斯科。写了若干篇故事,还写了《伊万·伊利奇之死》、《黑暗势力》、《教育的果实》、《克莱采奏鸣曲》,开始写《复活》。又生一子,即万尼亚。

第十个七年,从六十三岁至七十岁:

重新为饥民工作(在图拉省)。放弃他对1881年以后所写作品的著作权。写《天国就在你们心里》、《主人和雇工》、《谈艺术》。万尼亚夭折。

第十一个七年,从七十岁至七十七岁:

第一次患重病。《复活》问世。被革出教门^①。举家迁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冬季在克里木患肺炎及伤寒。开始编《阅读园地》。写了一批信和呼吁书:致同道者与信徒,致政府,致军方,致东正教徒,致政治与社会活动家……

第十二个七年未滿,从七十七岁至八十三岁:

他最心爱最知心的女儿玛莎亡故。暗中写下遗嘱,将他全部著作的著作权交给小女儿亚历山德拉,作品则由切尔特科夫掌握。1910年10月28日凌晨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出走,11月7日病逝于途中的阿斯塔波沃火车站。

他的死是他最终的“解脱”。

^① 在旧俄,每一个国民生下来都要在该地区的中心教堂登记、受洗,被认为是东正教的当然教民。

他早就想出走，逃离。早在 1884 年他就在日记中写道：“我难过极了……真不该不走。看来这是不可避免的。”

1897 年他又一次下决心出走，甚至写好了给夫人的诀别信，结果还是没有做到，因为抛下家庭就意味着只顾自己，而他这样做对家庭，对她会是一个多么大的打击啊！那时他写道：

“印度人即将进入六十岁就离开家庭到森林里去，任何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到了晚年都想一心一意侍奉上帝，而不再去嬉闹，搬弄是非，打网球，我也一样。我就要满七十岁了，我一心渴望安宁、独处、和谐——即使是不完全的和谐，而不愿再与自己的信念，自己的良知如此惊人地不一致……”

在出走的那天夜里他写下的也是类似的话：

“我的做法与我这种年纪的老人通常的做法一样，即抛弃俗世生活，以便独处，在一处僻静的地方度过一生最后的时日……”

也有人从旁怂恿他出走。在出走前一个月，他曾经写道：

“切尔特科夫来信指责我，揭发我，”——说托尔斯泰仍未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要把我撕成碎片。有时我真想离开所有的人。”

后来切尔特科夫为自己辩解说，他并没有坚持要托尔斯泰出走。这话不对。切尔特科夫只不过有点犹豫不决罢了，比如他在给一位托尔斯泰信徒保加利亚人多谢夫的信中曾经说：

“如果他出走，那么由于年迈多病，他已经不可能靠体力劳动生活。他也不可能拄着一根长杖去行乞，然后病倒病死在大路上，或者作为一名偶然路过的香客病倒病死在别人的茅舍中……仅仅因为他爱那些爱他的人，他的女儿们，朋友们，以及与他心灵息息相通的人们，他就不可能这样做。他不可能既这样做，又不构成对他人的残酷无情……”

无论怎样，托尔斯泰终于下定决心，完全有可能“死在大路

上”，并且对他人“残酷无情”。10月28日他已经在奥普京修道院了，他写道：

“1910年10月28日，奥普京修道院。（昨夜）十一点半躺下。睡到两点多钟。醒来之后，同前几夜一样，又听见开门声和脚步声。前几夜我没有看我的房门，今天一望，便从门缝中看见书房里有明亮的灯光，还听见沙沙的声音。这是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在找东西，可能在翻阅。前一天她请求我，要求我不要开门。她的两扇门都开着，所以她能听见我的任何动静。不管白天黑夜，我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必须让她知道，受她监督。又是脚步声，小心翼翼的开门声，她走过去了。不知为什么，这引起我无法抑制的憎恶和愤怒。想睡，睡不着，翻来覆去约一个钟头，点上蜡烛坐起来。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开门进来，问我身体怎样，说看见我点了蜡烛，感到惊讶。憎恶与愤怒越来越强烈，使我喘不过气来。我数了数脉搏，九十七下。不能再睡，我突然作出了出走的最后决定。我叫醒杜尚^①，然后叫醒萨莎^②，他们帮我收拾东西。我怕她听见，走出来吵闹，歇斯底里大发作，以后不闹就走不成，一想到这些我就发抖。五点多钟一切差不多就绪，我到马房去叫人套车。杜尚、萨莎和瓦里娅最后收拾停当。夜一片漆黑，我在通厢房的小路上迷失了方向，走进小树林里，撞在树上，给刺伤了，还摔了一跤，丢了帽子，找不到它，好不容易走出来，回到屋里，另拿了一顶帽子，打着手电走到马房，叫人套车。萨莎、杜尚、瓦里娅来了。我怕被追赶，浑身发抖。终于出发了。我们在谢基诺村等了一小时，我每分钟都怕她会出现。最后我们终于坐上火车，车开动了，恐惧消失，对她的怜悯渐渐上升，但我并不怀疑我做了应当做的事。也许我为自己辩

① 杜尚·马科维茨基是托尔斯泰的家庭医生、朋友和信徒。——作者注

② 萨莎是托尔斯泰的小女儿亚历山德拉的爱称。

解是错误的,但我觉得我挽救了自己,不是挽救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而是挽救了虽然很少,有时毕竟在我身上存在的东西。我们抵达奥普京修道院。我身体健康,尽管一夜没有睡觉,而且几乎没有进食。从戈尔巴乔沃站出发时,我们坐在挤满劳动人民的三等车厢里。这一段旅行很有教益,非常之好,虽然我没能好好领会。现在八点,我们在奥普京修道院……”

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出走以后究竟往哪里去,他没有明确的打算,只十分模糊地想过:“到国外什么地方去……比如去保加利亚……或者去诺沃切尔卡斯克,或者再往前走,去高加索……”最后一刻他选择了沙马尔金诺村的修道院作为第一站,他的高龄的胞妹就是在这里作为修女而终其一生的。

他在出走的那天夜里对小女儿说:“萨莎,你先留下,过几天我决定好上哪儿去再叫你来。我很可能到沙马尔金诺村去找你玛莎姑妈……”

“去找玛莎”意味着去找那久远的过去给他留剩在世上的唯一的人,那时他的一生刚刚开始,“我五岁,三哥六岁,二哥七岁,十一岁的大哥向我们三个弟弟宣布他有一个秘密,这秘密一旦被揭示,人们就可以藉它成为幸福的人,不再有疾病,不再有使人不快的事,谁也不再生谁的气,人人彼此相爱,成为‘蚂蚁兄弟’……”

“蚂蚁兄弟指的大概是莫拉夫斯基兄弟,是大哥从哪里听来的,或者从书上看到的。我记得当时我们特别喜欢‘蚂蚁’这个词儿,它使我们想起小土丘里的蚂蚁。我们甚至想出一种蚂蚁兄弟游戏,也就是找几把椅子,用些箱子盒子把它们围起来,蒙上些头巾,然后我们几个钻到椅子下面去紧偎在一起坐在黑暗中。我记得我体验到了爱和动情的特殊感情,因此很喜欢玩这种游戏。蚂蚁兄弟是什么我们明白了,但是那主要的秘密,即如何使所有的人都不再遭受不幸,永远不吵架不生气,而总是快快

乐乐的，大哥说他已经写在一根小绿棒上，而这根小绿棒又埋在了老禁伐林那个山沟旁的大路边，为了纪念大哥，我请求把我葬在那里，我的尸体反正得找个地方掩埋……”

他的暮年是难以表述地令人感动，难以表述地美。有一天，他和小女儿骑马经过那个地方，他的小女儿后来回忆道：

“我和父亲回家的时候经过那片林间树木稀疏的空地，那里的小土丘上春天总是开着一片蓝色的勿忘草花，夏天则长出许多肥美的牛肝菌，正面绒绒的，反面呈褐色，有粉红的根。父亲喊了一声：‘萨莎！’

“我刺了刺马追了上去，只听他说：‘就在这儿，在这几棵橡树中间……’他拉紧缰绳，扬了扬马鞭（使得马踉跄了几步），指着那块地方又说，‘我死后就把我埋在这儿……’”

在他最后离开自己几乎度过一生的宅子的那天夜里，他甚至也告别了这个梦想——长眠在故乡的几棵橡树间那块对大哥有纪念意义的地方。他说，“有时我真想离开所有的人。”他还可以给这句话加上：离开一切。

他为什么出走？当然也是因为“家居生活繁杂，家里不干净”。这是佛说的。也因为他和夫人多年以来为了切尔特科夫，为了财产不停地争吵，已经到了使他无法再忍受下去的程度……他的夫人竟至得了精神病，而夫人的那种跟踪监视也已发展到了极其可怕的程度。在这些不像话的争吵和在他看来是“奢侈的”，违反他的愿望的家庭环境中度日，也已到了丢尽脸面的程度。那么促使他出走的原因只有这些吗？

“我在这座疯人院里难过极了，”他在日记中曾经这样写道。

不过他也写过比这重要得多的话：

“里赫特^① 讲一位父亲在阴间教育子女的故事很好。为

^① 指让-保罗·里赫特(1763~1825)，德国作家。